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70

新字新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新學術之路

(下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印行

臺北 臺灣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新學術之路（上、下冊）

主 編 杜正勝 王汎森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 50 巷 4 弄 21 號
代售處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 1
三民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1 號 3 樓
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98 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出版

定價 精裝新臺幣 1200 元
平裝新臺幣 900 元

ISBN 957-671-608-X（精裝）

ISBN 957-671-609-8（平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
周年紀念文集／杜正勝，王汎森主編。 --
臺北市：中研院史語所，民 87
□；公分

ISBN 957-671-608-X（精裝）。 -- ISBN 957-
671-609-8（平裝）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歷史 2. 史
學 — 中國

619.2

87012753

目 次

上 冊

序	杜正勝	i
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 史語所的創立	杜正勝	1
懷故恩師傅孟真先生有述	陳 槃	43
憶傅斯年先生	孔德成	53
從張、傅往來書信看張元濟與傅斯年暨 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關係	周 武	55
史語所第一任所長傅斯年老師	楊向奎	73
顧頡剛先生與史語所	顧 潮	85
趙元任和史語所	卞趙如蘭	95
一九四九年前的陳寅恪——學術淵源與 治學大要	陳弱水	103
劉半農與史語所的「民間文藝組」	王汎森	119
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	石璋如	135
史語所的體質人類學家—— 李濟、史祿國、吳定良、楊希枚、余錦泉	王道還	163
蔡元培與史語所	潘光哲	189
胡適先生與中研院史語所	歐陽哲生	217
陳垣先生與中研院史語所	陳智超	233
史祿國學術思想與史語所學風	劉克甫	239
憶李方桂先生	周法高	251
南陽董作賓先生與近代考古學	李 濟	261
董作賓學術述略	鍾柏生	277

羅常培先生學術述略	劉 堅	295
羅莘田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羅慎儀	305
從徐中舒的治學看史語所的學風	唐嘉弘	311
徐中舒先生與夏文化研究	陳 力	319
記容希白師治學及待人之道	李 瑾	331
容肇祖與歷史語言研究所	王汎森	345
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	石璋如	353
郭寶鈞先生的考古事蹟及其在學術上的貢獻	鄒 衡	367
丁文江與史語所	潘光哲	379
中國建築史之父梁思成院士與史語所	黃銘崇	401
鄭天挺先生與史語所	鄭克晟	415
史語所的益友沈剛伯	杜正勝	423

下 冊

寫史正壯年——傅樂煥在史語所的日子	黃寬重	441
皓首窮經——陳槃庵先生小介	楊晉龍	455
師門識略——槃庵先生側記	陳鴻森	457
幾篇重要文字概述	勞 幹	461
李晉華與《明實錄》	王汎森	467
李光濤先生行述	周天健	475
俞大綱先生與史語所俗文學資料	曾永義	481
回首來時路	全漢昇	487
從「以書為本位」到「歷史問題」的探索—— 陳述在史語所時期的學術發展	陳雯怡	495
我在史語所的十年	張政烺	533

王明與歷史語言研究所	葛兆光	539
史語所一年	周一良	553
于道泉先生小記	王邦維	559
大匠示人以規矩——從王靜如先生教我 音韻學看王先生的治學方法	馮 蒸	565
一代語言學巨人——懷念丁聲樹先生	金有景	585
我對史語所的回憶	吳宗濟	605
工作即生命的董同龢	王守京	613
「啊，門——」緬懷周祖謨師	魯國堯	619
田野考古第一——吳金鼎先生	石璋如	631
我在史語所	石璋如	639
劉耀先生考古的五大貢獻	石璋如	655
考據與史料——胡厚宣先生治學與 史語所的傳統	胡振宇	663
通才考古家高去尋	杜正勝	677
夏鼐先生行傳	石興邦	709
凌純聲先生的民族學	李亦園	737
芮師逸夫先生最後的心願	桑秀雲	747
芮逸夫先生的學術成就及貢獻	宋光宇	749
韓儒林先生與元史、西北民族史研究的進步	陳得芝	759
遼欽立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王汎森	773
我在史語所的三年	楊志玖	783
李莊憶舊	王利器	791
王叔岷先生學行簡述	鍾彩鈞	811
李莊板栗坳·史語所——我終生懷念的地方	何茲全	819
周法高先生的學術與人生	周世箴	827

歷史的足音	馬學良	863
懷念我們的朋友楊希枚先生	楊寧蓀	877
屈萬里先生的治學與史語所	屈費海瑾	895
我與史語所	李孝定	909
學習甲骨文的日子	張秉權	923
嚴耕望先生與史語所之學風	廖伯源	933
我所認識的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田意	943
我在史語所任職二十三年的回顧與瞻望	吳緝華	951
南港述舊	許倬雲	965
史語所、李濟先生與我	張光直	971
溫舊業、念恩師，附論民國史學——		
憶史語所學習研究的日子	張春樹	975
我在史語所的研究	陶天翼	993
冬涼夏暖話當年	陶晉生	997
在史語所的那段日子	吳文彬	1001
史語所遷南港的第一倉庫	陳仲玉	1009
我與史語所	賈士衡	1015
猶有沃土長養華采	林英津	1021
徘徊在史語所門外	李亦園	1027
劉子健先生與史語所	黃寬重	1035
史語所與劉子健先生	柳立言	1039
我與史語所	饒宗頤	1043
對於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些個人回憶	田 浩	1049
英文目錄		1053

寫史正壯年

傅樂煥在史語所的日子

黃寬重*

一、簡歷

傅樂煥，山東聊城人，民國二年出生。他早年在濟南讀書，民國二十一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與張政烺、鄧廣銘、王崇武、王毓銓同學。民國二十五年畢業，隨即進入史語所當圖書員。二十八年十二月改任助理員，三十年六月任助理研究員。三十三年二月，升為副研究員。三十六年六月，由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深造。四十年以《捺鉢與幹魯朵》獲博士學位。史語所遷臺，他則回大陸，出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後改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歷史系副主任等職。民國五十五年五月去逝，享年五十四歲。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二、學史伊始

傅樂煥在大學時期即對宋遼史有濃厚興趣，在姚從吾教授的指導下，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及《遼史》為基礎，廣泛蒐集資料，寫了〈宋遼交聘使研究〉，附有聘使表。大約在民國二十五年四月間，他寫了一封長函給他的叔叔，時任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報告論文撰寫情形。他在信中指出，這一篇聘使表雖「只可算作材料之抄輯與排比，殊無發現」，但「亦頗有以正厲樊榭之誤，補錢竹汀之闕者」（《傅斯年檔案》IV：343，以下簡稱《傳檔》）。另一篇〈論今存宋人使遼的幾種記載〉文稿，則證明宋遼交通中最常引用的《富弼行程錄》非富弼原作，而是另一宋使薛映的作品；〈王曾上契丹事〉則是後人轉抄自《三朝國史》的〈契丹傳〉。信中充分顯示他對學術研究的信心。此外，已完成初稿的研究課題包括：〈宋遼高粱河戰爭記疑〉、〈宋朝對外失敗的原因〉等，總共約有一十萬字左右。其中〈論今存宋人使遼的幾種記載〉一文，經過多次修訂，並參酌姚從吾的意見與資料後，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為名，發表於《國學季刊》（第五卷第四期，民國二十四年）；〈宋朝對外失敗的原因〉則改以〈北宋對外失敗的原因〉為名，發表於《時代青年》（第一卷第六期，民國二十五年十月）。這幾篇論文出自二十出頭的傅樂煥之手，已展露他在宋遼史研究上的長才，而這種治學門徑，與傅所長重視之史料價值的路徑，正相契合。有了這樣傑出的成果，使他對畢業後的前途深具信心，而敢說「姪事惟望我叔代為作主而已」（《傳檔》IV：344）。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傅樂煥順利進入他的叔叔傅斯年所主持的史語所，擔任圖書員的職務，所憑藉

的正是他本身堅實的學術條件，而非傅斯年之姪兒的親戚身分。

傅樂煥就讀北大起，即與傅斯年先生有密切的關係。民國十八年春，傅斯年將史語所遷到北平，同年秋天，兼任北大歷史系教授，樂煥即常親炙他的教誨，並協助處理私事。從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起，國民政府內外交迫，傅斯年關心國事，撰文討叛抗日，奔走南北，參與國政，並不常在北平處理所務。樂煥係其近屬，雖仍就讀北大，卻已兼辦傅所長私事，而與史語所人員有所來往，甚至也住在研究所。大約在大學三、四年級時，董作賓至魯南考察，也曾邀樂煥同往（《傳檔》IV：336）。

三、輾轉遷徙

傅樂煥入所時，中日關係已然告急。傅斯年所長深知戰爭難以避免，為使學術資源不為敵所用，毅然決定將存放在北平乃至南京的圖書資料，遷到南昌、長沙。傅樂煥即為圖書南遷的參與人員之一。民國二十六年，大約在七七事變之後，史語所開始遷移圖書設備。當時日機時常空襲，北平氣氛非常緊張，樂煥在給傅所長的信中就說：「日機於星期四、五各來一次，昨、今兩日未來，今日各通衢皆堆有麻袋，聞係防漢奸佔亂及日兵之衝出交民巷者。總之，北平前途頗難說。」在這種情況下，書籍的南運工作成為一項倉促而艱鉅的任務。他說：「此次之運行，頗為倉卒。先是星期五下午，研究所通知以得來電，研究所什物將於星期日南運。星期六午，正在拆書架，研究所又來電話，謂所有擬運之物，必須當晚送至車站（翌晨

六時即開車也），而二點回信到，囑加運木器，以時間所限，只能多運單、雙書架各一及書桌一，其他來不及矣。」（《傳檔》IV：329）在緊迫的時程下，幸賴所內人員的努力，才能將重要文物資料運出北平。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中央研究院奉命西遷，史語所與地質所、社會所等所遷至長沙，與西南聯大前身之長沙臨時大學，共同借用長沙的聖經學校。但到十二月，長沙的情勢告急，中研院決定再度疏散。史語所又規劃將在南昌與長沙的圖書資料，分別遷到重慶和昆明。樂煥即受命執行圖書西遷到重慶的任務。從二十七年二月起到同年九月三日，他給傅所長的六封信，都是報告圖書由長沙西運的事情；如三月十日的信中提到資料送武漢的事，說：「此批物件原共百五十八箱，今以之分爲兩批，第一批先走百零四箱（今晚裝船明早即開行），第二批五十四箱（內二組三十八箱、三組七箱、李先生九箱）。待第一批到漢，存入法租界而尚有餘地時，再行啓運（其運行之一切手續，姪全已辦妥，由王寶先等監視、裝船即可矣）。如此辦法，似較一次全部運漢爲佳。」（《傳檔》IV：306）圖書輸運及房舍清理告一段落之後，中研院與臨時大學向聖經學校承租的房屋，乃轉給幹部學校，樂煥又擔任中研院的代表人，負責點交工作（《傳檔》IV：305）。八月，運抵重慶的部分檔案資料又移至昆明，也是在樂煥奔走聯絡下完成的。此時他身染虐疾，時常發作，十分辛苦，仍勉力將七部車的檔案資料運到昆明（《傳檔》III：691）。

圖書資料運抵重慶之後，首要的工作是清點、修補。從南昌、長沙以水路方式運到重慶的書籍，容易潮濕受損，其中甚至有因船傾覆而落過水的。因此曬書和修補成爲到重慶後的重

要任務。樂煥在九月廿二日向傅所長報告的信中就提到清點和曬書的事，他說：「曬書事因三週來終日陰雨，甚受影響，但除拓片、實錄而外，均已開過。」所有的書經檢查之後，發現有三種情況：(1) 發霉者不少，也有紙張變色的，但尚無大礙；(2) 自購善本的第九箱水濕嚴重，但除《邢氏先德錄》紙張已腐無法復修外，雖有損傷，尚可修整；(3) 被水浸濕而黏合的均逐葉揭開。當時，大部分圖書檔案被送到昆明，留在重慶的只有六十箱，包含群碧樓、自購善本、拓片、西文及實錄等。這時，儘管國難當頭，環境十分艱難，史語所在傅所長多方籌措下，仍由樂煥向外國訂購雜誌書籍（《傳檔》IV：334）。

樂煥隨史語所到了重慶，但他的母親及親屬仍在山東，這時山東在日本扶持之偽政權的統治下，無法與重慶直接聯絡，生活十分艱苦。民國三十三年秋天，國民政府鑒於抗戰勝利有望，為在日軍投降前進入山東，掌控政局，乃任命曾任山東教育廳長的何思源為山東省主席，到敵後發展組織。何思源與傅斯年為魯西同鄉、北京大學同學及《新潮》雜誌的成員，兩人興趣相近且關係密切，因此傅所長特別託何思源就近照顧樂煥家屬。過年時，何氏曾送傅家麵粉二袋（共值一萬三、四千元）（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傳檔》IV：331），後又以「主席私人所送」及「抗屬某某之費」的名義，撥給樂煥家二十萬元，使他深感不安，特於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致函傅所長，並說明擬請何茲全代為轉還這筆錢（《傳檔》IV：330）。

抗戰勝利，中央研究院籌備復員。由於交通工具不足，史語所遷回南京原址的工作，延至三十五年夏天才開始。但此時

樂煥卻為持續惡化的心臟病所苦。三十四、五年新舊曆年之交，樂煥的心臟病發作，一直到三、四月，天氣轉好，病情才有所改善。為恐耽誤全所東遷，樂煥特別於四月九日致函傅所長，說明病況，並表示：「姪如能走，自將隨同東返，如事實上必不可能，止有暫留。如果暫留，擬請研究所改發半薪」（《傳檔》IV：332）。他的心臟病似乎沒有好轉，當年十月三十一日，給傅所長的信中又說：「姪病近月來一般情形，略有進步，唯心臟趨弱，聽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體力所能支」（《傳檔》IV：333）。長期的病痛，可能是促使他再度出國的動力之一。

四、學術成就

傅樂煥從民國二十五年七月進所後，直到他出國期間，除了積極參與所內事務之外，在宋遼金史的研究上，也獲得卓越的成果。民國三十一年以前，他主要力量用於修訂大學時期所撰寫的〈宋遼聘使表稿〉一文，仔細查對《長編》、《宋會要》等資料，並以統計聘使、考遼帝后生卒年、遼帝后生辰改期受賀、《遼史》所記宋賀使之謬、《遼史》與《長編》聘使異名異職、《長編》、《遼史》使名誤字表，宋遼泛使等為附錄，寫成長達十萬餘字的論文，發表於《史語所集刊》（第十四本，民國三十四年）。同時開展新的研究課題。民國三十年已完成〈遼代四時捺鉢考〉初稿五篇，原先所擬定各章的標題是：一、遼代春水秋山考，二、廣平淀考，三、四時捺鉢總論，四、遼史遊幸表證補，五、駁池內宏遼代混同江考。經改定後，發表於史語所集刊第十本（民國三十一、三十二年出

版），這篇論文以遼帝春水秋山等行跡為主線，對有關地名進行了全面而細密的考察，糾正了前賢及日本學者許多錯誤，「對了解遼的疆域和地理極有參考價值」（《遼史叢考》出版說明）。說明契丹帝國實包括兩個國家，一由契丹人以及漢人以外各族人組成，由遼帝自行統治之，一由漢人組成，由遼帝委漢大臣統治之。更藉此指出遼代政治中心，不在漢人爲主的五個京城（即五京），而在遊牧式的捺鉢，對認識遼的二元統治極有貢獻。此外，補《遼史》〈遊幸表〉、考《遼史》〈天祚帝紀〉的來源等，均對遼史研究有重大的貢獻。這一篇論文體現乾嘉堅實考證的風格，細密的論證和開闊的學術眼光，是史語所標榜新史料、新學術的範例，因而榮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楊銓獎爲紀念故總幹事楊銓（杏佛）所設，頒給對人文科學研究有新的貢獻者，分文史與社會科學二類，每屆頒給其中一類，這在中央研究院是一項至高的榮譽。

除了〈四時捺鉢考〉外，樂煥也著手撰寫〈宋遼疆界考〉及〈宋遼交通考〉（見王懋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史資料初稿》，以下簡稱《所史資料初稿》，民國三十一年報告），記熱河遼慶州，中京城址出土銅錢二篇（《所史資料初稿》，民國三十三年報告），〈讀《遼史》〈部族志〉、〈職官志〉〉及〈廣平淀釋名〉（此文後改名爲〈廣平淀續考〉刊於《六同別錄》中冊，民國三十四年）（《所史資料初稿》，民國三十四年報告），〈行省制度之起源〉、〈《遼史》複文舉例〉初稿成於李莊，經增訂後刊於《集刊》（第十六本，民三十六年）（《所史資料初稿》，民國三十五年報告）。此外，〈《青宮譯語》箋證——宋高宗母韋太后北遷紀實〉一文，原刊於大公報《文史週刊》十九、廿兩期（民國三

十六年三月五日、十七日），後收入《遼史叢考》，這篇論文是對描述靖康之役後，金人俘高宗的母親韋氏、妻邢氏等，遣赴上京的一本筆記——《青宮譯語》——加以箋證，並介紹《靖康稗史》七種的史料價值，指出這七種記載都是宋金之際的重要史料，其中六種為罕見傳本。樂煥在文中說他對這六種書，曾加勘查，《呻吟語》一書並另有箋證，準備出版，可惜未能如願。樂煥在文中對《青宮譯語》詳為箋證之外，並輯錄高宗母親韋太后北遷的相關史料，作為附錄。這篇文章的篇幅不長，卻勾勒了一段重要而長期隱晦的史實，揭示了史料的價值，極富意義。四十年後，崔文印箋證的《靖康稗史》（中華書局，1988年出版），即多參照本文。

五、出國進修

傅樂煥曾爭取出國進修的機會。從他致傅斯年的信中，可知他大約在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參加過庚款的考試，但成績不理想。在這封信中，他很懊惱的向傅所長表示歉意。他坦誠準備不足，臨時抱佛腳，致緊張過度是考試失利的主因。所以要在毫無準備下貿然一試，是他覺得考場設在重慶大學，距離較近，又聽說教育部以後不錄取文法科名額，怕錯過機會，「感情壓倒理智」。但考前過於緊張，「睡眠較少，致考時精神竟不能支」，以致臨考時「直想不出字來」（《傅檔》IV：335）。同時，往年的試題多且可以選擇，本年則少而無法選擇，考試題目多偏於古史，與招生簡章及往年慣例大異，他所做準備都無效。只有近代政治外交史考得比較好，國文與英文也都欠佳。各科都不理想，自然慘遭「滑鐵盧」了。直到民國

三十六年，獲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他出國進修的願望，才得以實現。當年六月，樂煥向史語所請假，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進修。

傅樂煥赴英後，仍關心學術與國家前途。大約在樂煥赴英前，傅所長也因高血壓赴美就醫，住在 New Haven。樂煥有信報告行程、問候病情及在英學習情況。信中提到他由滬赴英共歷二個月，倫敦物價甚高，每月食宿需二十幾英鎊，而獎學金只有三十鎊，生活拮据（《傳檔》I：889，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的信）。他說「英人整日喊窮，以我們的眼光來看，他們仍在天上」（《傳檔》I：888，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的信）。他一註冊，就選了五門課，包括西藏文、波斯文、政治經濟思想史、歐洲中古經濟史及歐洲中古近世史大綱等，分量相當重。他覺得剛開始聽課很有困難，希望二個月以內可以適應。西藏文是史語所老同事于道泉所教（《傳檔》I：888，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的信）。

後來他與于道泉熟稔，知道于有意返國，乃於三十七年四月五日向傅所長寫信，介紹于道泉的情況，說他因思想左傾，又與系主任不和，倫敦大學不再續聘。于想編西藏字典，希望國內有學術機構與他合作，替他找一個人，擔任抄寫整理等工作。樂煥說于道泉的英、法、德文實在好，若長此頹廢下去，實在可惜，如今他發願編西藏字典，希望能得到傅所長的協助，在史語所或北大、北平圖書館、邊疆文化教育館等機構找助手，促成此事（《傳檔》IV：475，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同月十日再度致函傅所長，說「道泉編字典（西藏文字典）於他性情相宜，於他所學相宜，於國家亦相宜」（《傳檔》I：890，四月十日的信）懇切請傅先生助成其事。當年夏